

【出版传媒研究】

开明书店与近代的“知识启蒙”

王晓霞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社科部,天津 300222)

摘要:甲午战争后,“知识启蒙”成为全社会的集体诉求,以出版机构为主的新式传媒成为主要的“知识生产基地”,其中民营出版机构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开明书店创办于1926年,以教育出版、文化出版为理念,吸引了一大批“以出版进行启蒙”的文化人参与其中,并注重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感的塑造,形成“开明人”的认同,营造“开明风”,出版了大量高质量、较有影响力的书刊,促进新知识、新文化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

关键词:开明书店;知识传播;文化营销;开明人;新文化;知识启蒙

中图分类号:G23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3)04-0107-05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大批出版机构纷纷设立,在新知识、新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开明书店创办于1926年,以严谨、质朴和踏实的风格著称,在出版实践中营造“开明风”,聚集了一大批的“开明人”,出版了高质量、高品位的出版物,涉及教科书、妇女、古籍、工具书等众多门类,促进了近代知识文化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笔者利用报刊、文集等数据,通过描述开明书店的沿革、文化出版理念的构建、传播新知识文化的努力,考察出版机构与知识启蒙的复杂关系。

一、开明书店的沿革

开明书店的设立有复杂的社会背景。首先,20世纪上海成为全国的出版中心。拥有丰富的智力资源、技术设备及出版理念。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现代出版机构的建立。其次,开明书店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产物”^{[1][27]}。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实现了国语革命,“出版界出书的数量大增”^{[2][387]}。而且,新图书馆运动的开展,不仅为出版社组织出版和开发选题提供了重要机会,而且创造了广泛的读者群,开辟了广阔的图书消费市场。这为开明书店的成立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再次,自办书店的风气。当时出版界新人发表作品困难,不少人“去纠合同志,开设书店”^{[3][282]}。这在当时的出版界成为一种示范,逐渐为许多文人效仿。开明书店的成立得益于这种风气。最后,同仁的努力。章锡琛曾说:“开明的创办,实在是由许多朋友所促成的……那时主张创办书店最力的,是胡愈之、吴觉民两先生,尽力帮助创办的是钱经宇、郑振铎诸先生。至于开明书店这个店名,是孙伏园先生取的,第一块招牌也是孙先生写的。”^{[4][25]}在众人协助下,开明书店于1926年8月正式在章锡琛家里(宝山路里60号)挂牌营业。

在创办之初,开明书店以“指导青年文化知识”为宗旨,出版文学作品和科普读物。1928年,开明书店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确立了“以广大的中学生和青年学生”为对象的出版方针,创办《中学生》杂志,并创办了美成印

收稿日期:2013-03-27

作者简介:王晓霞(1985-),女,山西运城人,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出版史。

刷厂。1934年4月董事会通过开明书店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大纲,设立董事会、常务董事会作为最高的决策机构,下设有经理协理管理公司的日常经营和行政事务^{[5]281-335}。书店门面逐渐扩大,编辑机构迁至虹口梧州路,发行所从宝山里迁至旧上海书业集中的望平街,后又迁到福州路。

同时,开明书店还招募文化人,如叶圣陶、夏丏尊、王伯祥、傅彬然、宋云彬等。大致说来,书店的从业人员来源于立达学会、文学研究会、商务印书馆以及书店培养的人员。他们多来自浙江、江苏两省,这与江南文化转向上海的现实有关^{[6]133-159},乡缘、血缘和姻缘关系是较为明显的特征。工作人员或住在章锡琛的家里,或开明自备汽车接送员工上下班,或建立“开明新村”解决员工的住宿问题,或组成“明社”,“举办开明书店工作人员的训练班,业余传授各种文化知识和业务知识”^{[7]212}。

日军占领上海时,开明书店遭受巨大的损失。1939年《中学生》在桂林复刊,称为《战时中学生》,增加了“每月社谈”等时势内容。1941年范洗人在桂林设立“开明书店驻外总办事处”,统筹书店事务。抗战胜利后,开明书店不仅重建在战争中被毁的店铺,而且在开封、南昌、福州等地开设分店。上海解放后,开明书店成立工会,邀请工会代表组织“店务管理委员会”,重新修订了行政组织系统,在业务分工上较前更为明确。1950年开明书店向国家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很快得到批复。出版总署于1954年批准开明书店与团中央的青年出版社合并,正式成立中国青年出版社。

二、文化出版的理念

开明书店坚持文化出版的理念,坚持出版高质量的书籍。开明书店不惜重金邀请当时各界著名的学人编辑图书。林语堂、丰子恺、夏丏尊、赵景深、叶圣陶、顾均正、茅盾、郑振铎、朱自清、王伯祥等都是书店的重要作者。书店的“吃饭书”之一《明英文读本》,作者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林语堂先生。他大胆改变了以往教条的单调的英语学习,采用对话的方式,丰富了英语教学的形式,激发青年学生学习英语的热情,使得该书在市场上广受好评。开明书店“吃饭书”之《中学生》杂志,邀请叶圣陶、夏丏尊等教育名家担任编辑。他们长期执教于中学,有着丰富的经验,深谙中学生的阅读心理,编辑的刊物寓教于乐,体例清新。由此,《中学生》杂志赞誉不断,成为书店发行量最大的刊物,每期发行高达数万册,是当时中学生的良师益友。

开明书店是有名的同人书店,注重企业文化和服务精神的塑造,培养员工的企业认同感,如“开明人”的认同,“开明风”的营造。叶圣陶、王伯祥等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后相继转到开明书店,主要是因为开明书店的文化出版理念。叶圣陶在开明书店二十年店庆之际,写下了概括开明人的精神风貌和深刻内涵,彰显开明书店稳健、踏实的风格的诗句:“书林张一军,及今二十岁;欣兹初度辰,缕金联同辈。开明夙有风,思不出其位;朴实而无华,求进勿欲锐;唯愿文教敷,遑顾心力瘁?此风永发扬,厥绩宜炳蔚。以是交勉焉,各致功一篑。堂堂开明人,俯仰两无愧。”

开明书店积极参与“知识启蒙”的活动。1935年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为实现“民族腾飞”、“增进精力”而主办“全国读书运动大会”,开明书店积极支持,精选各类质量较优的图书,以较低的价格出售。书店还赞助由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主办的“读书竟进会”,提供多种优秀的图书。此外,书店以“读书”为市场的诉求,策划一系列图书营销活动,开办了读书会、中学讲义社、读者俱乐部、读书运动周,不断彰显书店文化出版、教育出版的理念。这些均是书店文化出版理念的内在要求,更是社会关怀的体现,“知识启蒙”的努力。

开明书店在南京、重庆、成都、广州、北京、长沙、杭州、南昌、昆明、贵阳、台北、汉口、上海、西安、桂林、沈阳、开封等地设立分店^[8],或与各地的书店建立代购、代销业务关系等^[9]。开明书店还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江苏省农业银行订立协议,与邮局订立代订《中学生》杂志的协议,扩大杂志的销量。此外,开明书店还通过多种经营方式,拓宽开明书店发展的管道,发行开明英语正音片、稿纸、日历、各种信笺以及五线乐谱稿纸等。

三、开明书店“知识启蒙”的努力

开明书店不仅塑造和传播着现代出版文化,而且坚持“知识启蒙”的理念,出版了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书籍,包括教科书、古籍、工具书、妇女著作、诗歌、小说、散文等。这不仅促进出版机构的持续发展,而且推动了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可从开明书店出版量和出版物两方面进行考察。

1. 开明书店的出版量

关于开明的出书数量,《开明书店纪事》中载:“开明书店从成立起至上海解放,历时二十余年,共约出版书刊一千五百种左右,平均月出新书五、六种,抗战前的二三年中出书较多,平均月出十种左右。到上海解放之日为止,实际上还在印行的约有六百种。”^{[1]297-321}这只是一个模糊的描述,那么开明书店究竟出版了多少图书?笔者根据方厚枢的《民国时期总书目》、邱崇丙的《民国时期图书出版调查》以及《民国时期总书目》的收录,进行统计分析,详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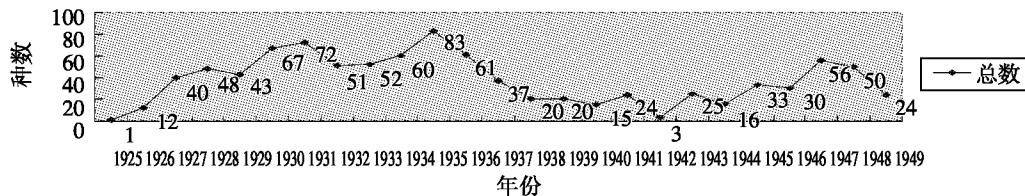


图1 1925—1949年开明书店出书趋势

从图1可知,开明书店在1925—1949年间共出版943种,其中在1935年出书量达到最高,计83种。以1937年为界,之前开明书店处于上升时期,此后发展形势则时好时坏,极不稳定。

为详细地呈现开明的出版量,笔者根据现代图书馆分类法对开明书籍进行分类统计,见图2及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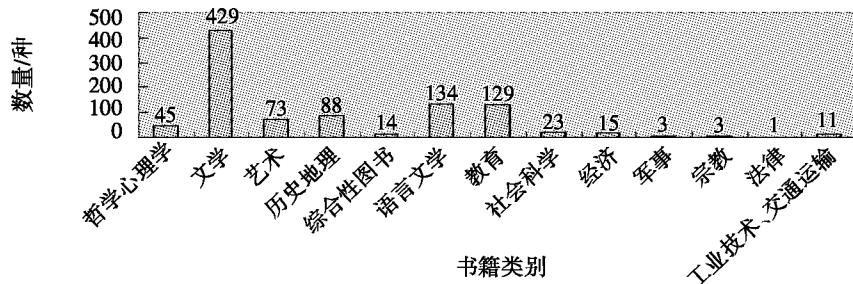


图2 开明书店出版各种类型书籍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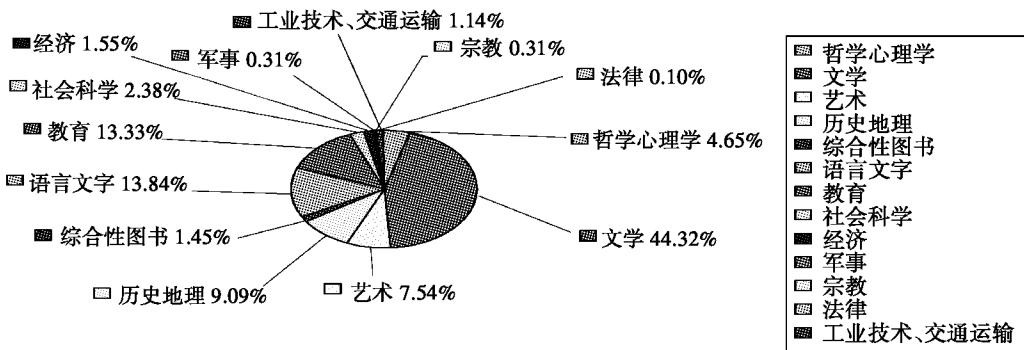


图3 开明书店出版各类书籍百分比

从图2、图3可知,文学、语言文字、教育类书籍是开明书店的出版重点。文学为429种,比重高达44.32%;语言文字为134种,占13.84%;教育为129种,占13.33%;历史地理为88种,占9.09%;艺术为73种,占7.54%。这些共占比重为88.13%,相比较而言,社会科学、法律、哲学心理学等所占比重则较小。

2. 开明书店书刊分析

开明图书的作者主要是书店的编辑如叶圣陶、夏丏尊、赵景深等,及不少当时著名的学者、作家,如郭沫若、冯友兰、胡绳、黄裳、刘半农、郁达夫、闻一多、老舍、鲁迅、舒新城、汪静之、巴金、冰心、茅盾等。此外,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国际问题研究会、国立编译馆等团体或与开明书店合作编写,或将出版的书籍委托开明书店发行。开明书店对书籍出版有严格的选择标准:“当取谨慎的态度,不单以盈利为标准。非比较有价值的读物,决不随意发刊。”^[10]以下就教科书、古籍、工具书、期刊等分别说明。

在教科书方面,开明书店出版了《开明英文读本》、《开明活页文选》、《开明国文教本》、《开明算学教本》、《开明文言读本》、《开明本国史教本》等。《开明英文读本》由语言专家林语堂编写,选择“有趣的文学故事”、“添附鲜艳的彩色铜板”、“采用简单的牛津读音,附注详细的教授方法”^[11],并经多位资深英语教育者的修订,还通过教育部的审定,成为最畅销的英文教材。《开明活页文选》是开明书店独创的单页出版物。编辑“选出名文数百篇,从古文到现代白话文,凡议论、记叙、小说、诗歌、戏曲、各体文字”、“添加新标点分段,精细校对”、“既不如教科书之呆板,又免油印讲义模糊脱讹之弊”^[12],发行较为自由,价格低廉,成为各地中小学校的语文教材。与此同时,书店还将活页文选编辑成册发行,出版《〈开明活页文选〉分级合装册》、《开明文选类编》、《开明活页文选注释》等。

在古籍方面,开明书店着重推出《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新元史》、《六十种曲》、《开明版四史》等,以《二十五史》和《二十五史补编》影响较大。开明版的《二十五史》是在《二十四史》之上,添加柯劭忞的《新元史》,并在各史后面附加参考书目、人名索引,以“体例完备、检查便利、印刷清楚、携带轻便”^[13]为特征。此书受到史学界以及教育机构的欢迎,上海市教育局等机构预定数册颁给市图书馆及各教育单位^[14]。由于正史中缺少表、志,而且不少表、志都散在各种丛书中,读者很难找寻,于是开明书店“搜辑历来史学家关于补订各史表志的重要著作”^[15],编辑成《二十五史补编》。该书得到很高的评价,胡适曾说:“《二十五史补编》收集了历来学者整理或补订诸史的著作,是三百年史学功力的一个大纂集,是今日治旧史者不可缺少的工具。”^[16]

在工具书方面,开明书店出版了《第一次教育年鉴》、《十三经索引》、《辞通》、《开明文学辞典》等。《十三经索引》是叶圣陶集全家之力编辑而成,他们“将十三经全文逐语分割,按语百字之笔划多寡排比下注”,历经五年出版,为“国故专家、国文教师以及中学以上学生之爱好研究国学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7]。《辞通》原名为《读书通》,是朱丹九集 30 年之功的研究成果,共 24 卷,300 万字,“以两字联系之词类为本位,依类相系,以普通易识之辞频冠其首,而以生僻字、假借字及古书中之别体异文次其下。每组复加按语,说明其所以通,所以变,所以慎之故”^[18],这对国学研究颇有帮助。在该书出版之时,开明书店添加索引和四角号码,便于读者查阅。

在期刊方面,开明书店出版了《中学生》、《新少年》、《新女性》、《战时中学生》、《国文月刊》、《开明》、《暨南学报》、《中学生文艺》等。《中学生》杂志以“指导青年学生的学习和文化”为宗旨,以“学生的良师益友和伴侣”为出版理念,开辟“探讨社会、文化问题”、“指导学生学习”、“读者之页”、“科学零拾”、“通讯”、“回答”以及“编辑后记”等栏目。在抗战时期,《中学生》改为《战时中学生》出版,内容上增加了“每月社谈”等,引导学生了解时势,关注社会。该杂志的发行量高达数万册,影响到边远地区的学生。

此外,开明书店还出版了丛书系列,如《妇女问题研究会丛书》、《世界少年文学丛刊》、《文学周报社丛书》、《开明少年文学丛书刊》、《开明少年丛书》、《开明中学生丛书》、《开明文艺译丛》、《开明文史丛刊》、《开明青年丛书》、《开明青年英语丛书》、《春蜂乐会丛刊》、《黎明社丛书》、《微明丛书》等。

四、余论

1896 年以来,通过“知识启蒙”以启迪民智、塑造新国民,成为一种全社会的集体诉求,以出版社为主体的新式媒体则在这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商务印书馆即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宗旨,不仅开启了民营出版机构发展的新时代,而且迈开了中国传统出版业近代化的步伐。进入 20 世纪,上海已成为全国出版文化的中心,拥有最先进的出版技术和管理理念,是新知识、新文化的生产基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尤其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大量民营出版机构的涌现,成为生产、传播新知识、新文化的主要载体。这改变了以往教会、官书局占主导地位的出版态势,显示了后“新文化运动”时代上海出版业的显著特征。正如芮哲非所言:“(出版业)从上海向外扩散,现代印刷的技术功能和出版业的智育作用对整个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19][63]}开明书店致力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创办伊始在兼顾商业利益的同时,以教育出版、文化出版为理念,并注重出版的社会和文化效益,构建和谐的企业文化,传递着出版人的社会担当。具体而言,开明书店聚集了一大批文化人,形成“开明人”的认同,秉承“知识启蒙”的追求,积极参与社会文化事业建设。正是这种文化追求的理性推动了新知识、新文化的标准生产,开明出版了种类丰富,卷帙浩繁的出版物,其中不乏具有影响力的书刊,如《开明英文读本》、《二十五史》、《中学生》等,涉及教科书、古籍、工具书等门类,促进新知识、新文化的传播,“知识启蒙”得以彰显。

参考文献:

- [1]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G].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 [2]张静庐.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现代丁编[G].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 [3]陈福康,蒋青山.章克标文集[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 [4]纪念开明书店创办二十周年[G].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
- [5]汪耀华.民国书业经营规章[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 [6]苏智良.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态[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 [7]刘增人.叶圣陶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 [8]开明书店服务网[J].开明,1948(4):16.
- [9]上海开明书店招请外埠同业特约经售[N].申报,1932-07-27(4).
- [10]开明书店始业宣言[N].申报,1936-06-01(21).
- [11]开明英文读本[N].申报,1928-08-11(5).
- [12]开明活页文选[N].申报,1931-02-04(7).
- [13]开明版二十五史[N].申报,1934-09-01(3).
- [14]上海市教育局整批订购开明版二十五史[N].申报,1934-10-16(3).
- [15]二十五史补编[N].申报,1935-03-17(2).
- [16]二十五史补编[N].申报,1935-04-28(4).
- [17]十三经索引[N].申报,1934-05-16(4).
- [18]辞通[N].申报,1935-09-10(3).
- [19]王荣华.多元视野下的中国[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Kaiming Book Store and Knowledge Enlightenment

Wang Xiaoxia

(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Tianjin 300222,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knowledge enlightening became the pursuit of the society. Publishing in new media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t, most of which were commercial. Kaiming Book store was built in 1926, aiming at education and culture publishing, attracted some cultured people, who tried to publish books in order to enlighten the people, and formed the conception of “Kaiming people” and “Kaiming atmosphere”. Meanwhile, it published plenty of good quality and more important books and magazines. It advanced the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and formation of culture in society.

Key words: Kaiming Book Store;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cultural marketing; “Kaiming people”; new culture; knowledge of enlightenment

(责任编辑 张春生)